

十三行

习俗与商业禁忌研究

• 谭元亨 宋韵琪 唐嘉鹭 著
Shisanhang
xisu yu shangye jinji yanjiu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十三行研究丛书
SHISANHANG YANJIU CONGSHU

十三行

• 谭元亨 宋韵琪 唐嘉鹭
Shisanhang
xisu yu shangye junji yanjiu

习俗与商业禁忌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三行习俗与商业禁忌研究/谭元亨，宋韵琪，唐嘉鹭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9
(十三行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3-3667-9

I. ①十… II. ①谭… ②宋… ③唐… III. ①十三行 - 研究 IV. ①G752. 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6525 号

十三行习俗与商业禁忌研究

谭元亨 宋韵琪 唐嘉鹭 著

出版人：韩中伟

出版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责任编辑：王 岩 李 欣

印 刷 者：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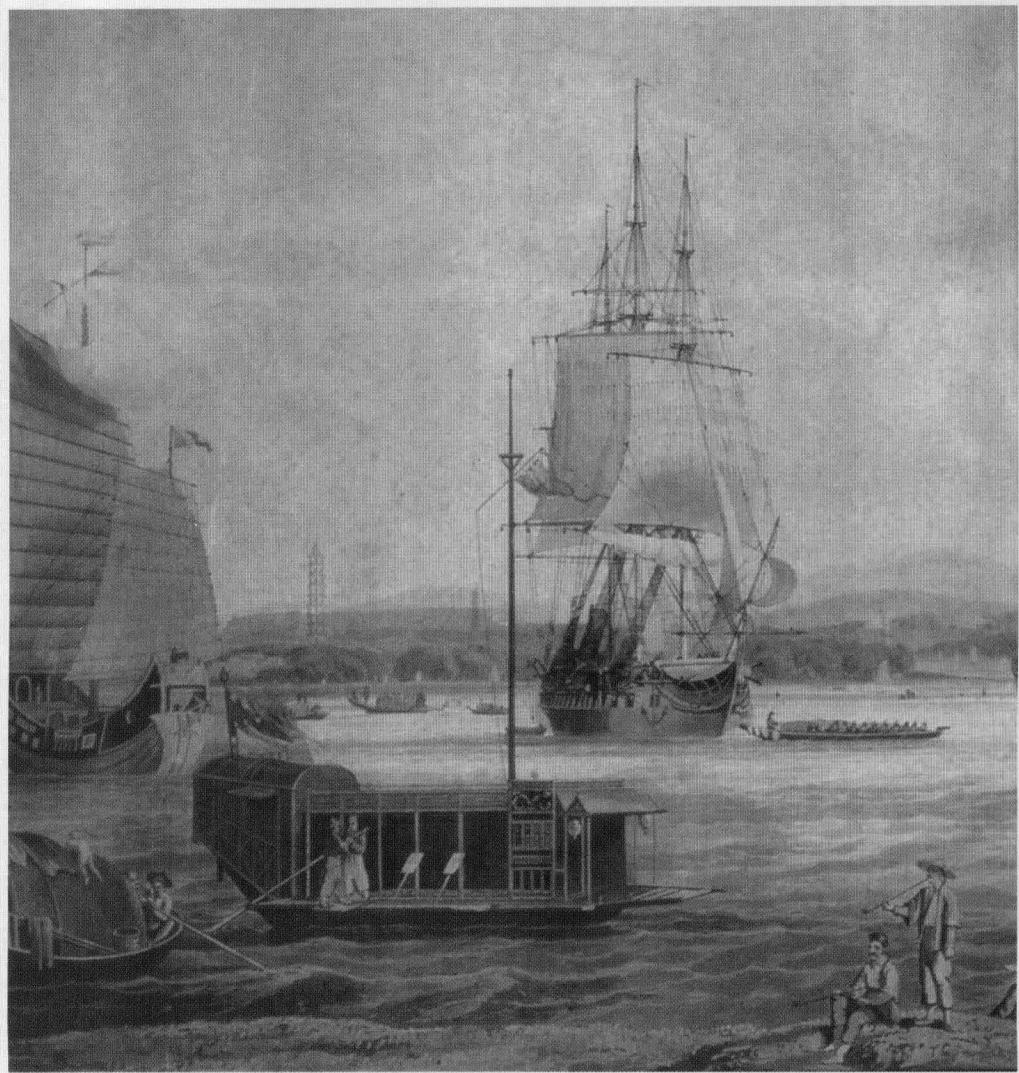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75 插页：4 字数：211 千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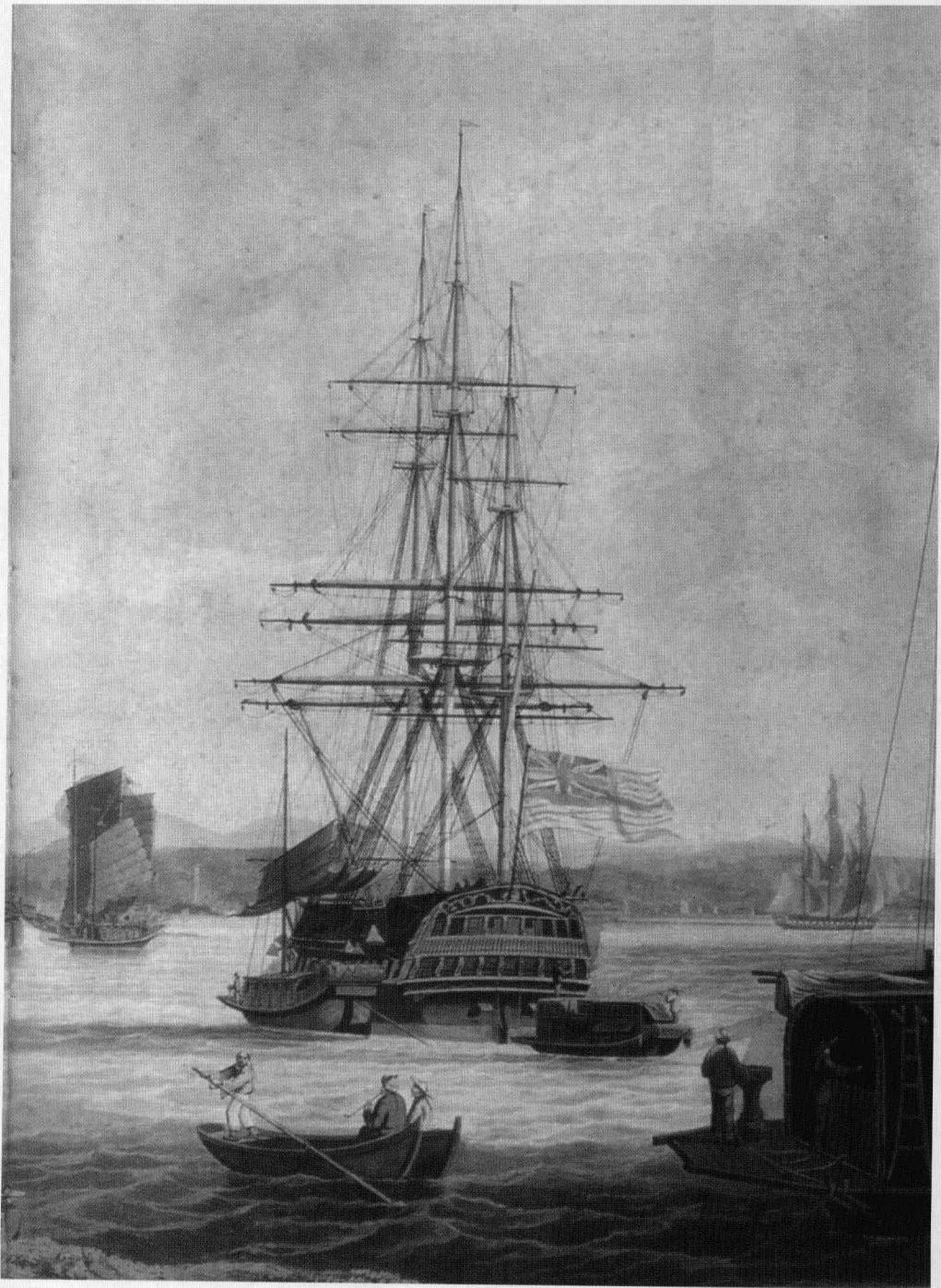
印 数：1 ~ 1 000 册

定 价：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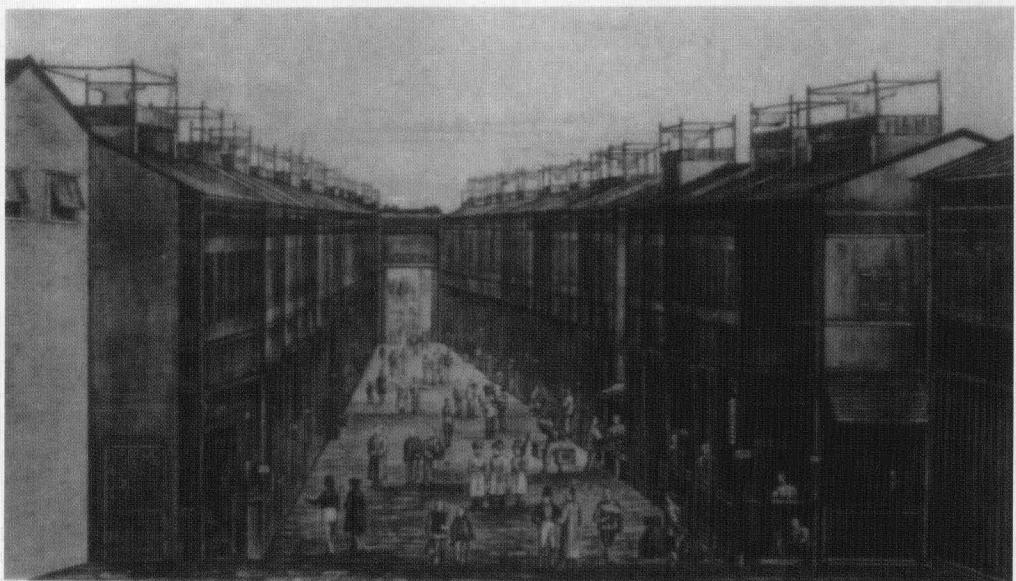
十三行



黄埔帆影



黄埔帆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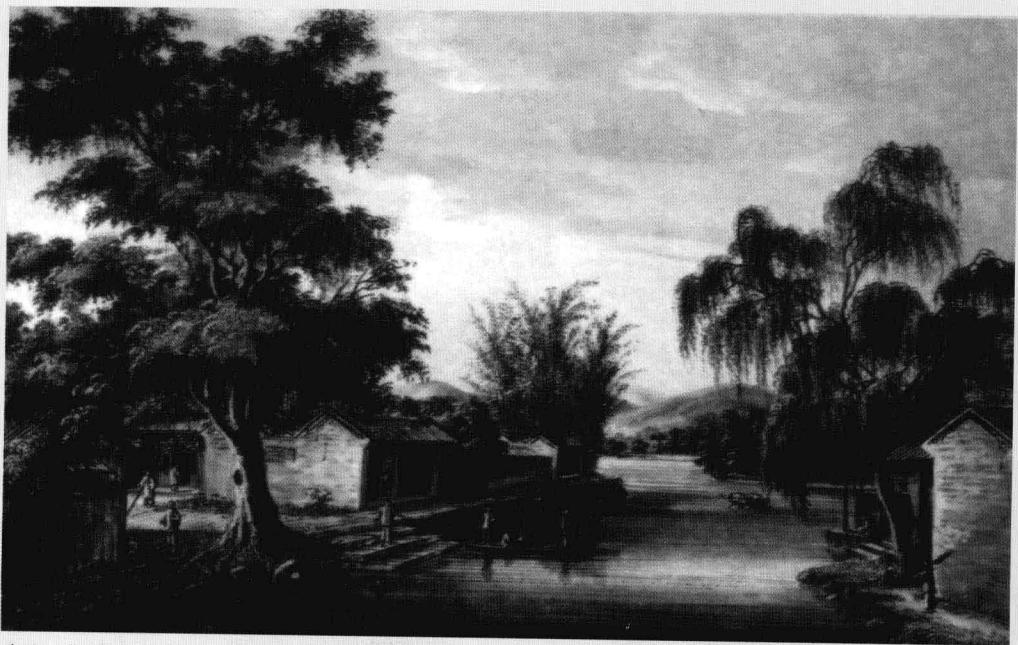
钢笔画：1839年十三行靖远街的街景



广州荔湾区至今仍有昔日的靖远路



广州海幢寺今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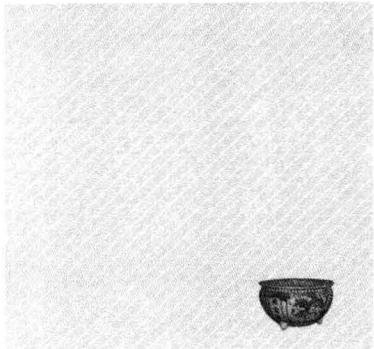
广州城西南的花地风景区

目 录

卷首语	(1)
导论 另一扇洞开的“历史之门”	(3)
一、小引	(3)
二、界定	(4)
三、大海的赋予	(5)
四、“有功则祀”	(6)
五、历史的折射	(9)
六、南方的商业伦理	(10)
第一章 民俗事象与地域文化性格习俗	(14)
一、从文化现象走向文化哲学探析	(14)
二、粤商的文化性格	(17)
三、还原十三行商贸圈历史现场	(21)
四、相沿成风，相习成俗	(24)
第二章 粤商的商业精神与民俗演变	(27)
一、从“四民之末”向“四民之首”演进	(27)
二、龙舟习俗与竞争精神	(29)
三、睁开眼睛看世界	(30)
四、炫富与戒奢	(33)
第三章 海神的演绎与商业文明	(36)
一、海神、水神及其他	(36)
二、天妃海神的上升	(39)
三、草根神祇的亲民色彩	(45)
第四章 粤地的商业信仰禁忌	(49)
一、信仰——神灵的膜拜	(52)

二、禁忌——习惯性的恐惧延续	(56)
三、风水——不仅仅是迷信	(61)
四、征兆——对吉凶的预言	(63)
五、行规——既定的行业“规矩”	(66)
第五章 清代粤商信仰禁忌习俗成因探析	(68)
一、岭南地缘状况的生存困境（地缘）	(71)
(一) 海洋的风云变幻——难以把握的现世	(72)
(二) 湿热的岭南气候——“瘴疠之乡”的恐惧	(73)
(三) 地域的自我特性——惯性“政治失宠”	(73)
(四) 医学技术的“迟到”——岭南方术的流传	(74)
(五) 中原传统的疏离——核心理性的迷失	(75)
二、繁华梦影下的不安与寄托（社会历史）	(75)
(一) 朝廷权力的压迫——“天子南库”的无奈	(76)
(二) 商业经营的吉利诉求——对于财富的渴求	(81)
(三) 贸易地位的不平等——有名无实的“红顶商人”	(83)
(四) 社会地位的赎买——求贵之路	(89)
第六章 商业迷信与粤商自我人格建构	(92)
一、信仰者的辐射：从神到人的规范	(93)
二、信仰者的自我印证：存在合法性的构建	(96)
三、矛盾的自我挣扎——实用理性思维的抗辩	(97)
(一) 信仰的泛化与真正宗教信仰的缺失	(97)
(二) 知其不可信而信之的尴尬	(99)
四、异地会馆供奉——信仰的延展	(100)
第七章 信仰禁忌反映的文化心理	(103)
一、传统文化心理分析	(103)
(一) 血缘理念——传统价值心理	(103)
(二) 人本定位——信仰，而不沉溺	(104)
(三) 文化情结——对文化的渴求	(105)
二、岭南文化“语境”分析	(107)
(一) 务实功利——“实用”的信仰禁忌	(107)

(二) 开放兼容——“不拘一格”的精神崇拜	(108)
(三) 重商情结——神祇的普遍商贸“功能”	(109)
(四) 非规范性——众神图谱的重绘	(111)
第八章 商业伦理的现实转场	(114)
一、从神到人的道德形象	(115)
(一) 公正万能的领导者	(115)
(二) 精神归属的行业神	(116)
二、从虚幻到现实的道德规范	(117)
三、理想化的神秘制裁力量	(119)
第九章 十三行谣谚与传说评述	(122)
一、虎豹龙凤，江淮河汉	(123)
二、却洋舶馈	(125)
三、“一船蚕丝去，一船白银回”	(125)
四、从“愈烧愈排场”到“一夜有清光”	(128)
五、鱼上了梁	(130)
六、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132)
七、定风珠	(135)
八、木龙，一舟司命也	(137)
九、出海祀神	(137)
十、美国太平洋铁路传奇	(138)
十一、虎豹龙凤狗 江淮河汉沟	(141)
十二、十三行小说中的民俗	(143)
第十章 行商信仰的传承与发展	(146)
一、行商民间信仰的演化	(146)
二、民间信仰习俗的社会价值	(149)
后记	(153)
参考文献	(156)



卷首语

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两朝之际，粤商，包括十三行商人，每每被认为是充满迷信意识的一群人。他们讲究“意头”“风水”，大至新铺开张、年终“尾牙”、商铺供神，小至吃饭饮酒、说话行为都颇有讲究，不能随意而为。粤地商业在明清十三行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而种种信仰禁忌亦更为讲究。流行于粤商及十三行行商中间的种种禁忌信仰，其实是有其多方面文化因缘的。

第一，从地缘上说，被称为“瘴疠之乡”的岭南地区由于温热湿润、医学技术落后，常会有奇难杂症流行，人们终日惶惶。同时，面临海洋的变幻莫测，粤人心底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安，种种情绪寄托在信仰禁忌的实现上，便形成了“粤人俗鬼”“迷信得认真，有魄力”（鲁迅语）的浓重氛围。

第二，从社会现实方面而言，清十三行粤商虽说似乎占领了“一口通商”独特优厚的营商环境，但亦始终处于洋人与政府双重压迫的地位，缺少保障的商贸体制，以及自由商人本身的散乱，使他们的生存步步为营，充满彷徨、不安、焦虑，而笃信风水命理，其实只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外在形式获得支持的力量。

粤商的信仰禁忌，又可以从多角度找到阐释理解的空间：

首先，从商人自我人格本位而言，从神到人，可以说是粤商自我印证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规范、自我对话的重要形式。通过这些信仰习俗的辐射，他们构建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在文化冲击中找到依然被承认的理由。

其次，从文化心理来说，其信仰禁忌习俗一方面是血缘依恋、文化情结、人本定位、意识习惯等文化心理因子的反映，另一方面亦是岭南文化性格的展现。在清代粤商的信俗中，更可以窥见这个特殊群体的商业伦理认知。

信俗，毕竟是长久的文化心理的积淀。从信仰到现实，正是在伦理认识中得到真正的转场。而正是这种真正的转场，洞开了另一扇历史的大门，尤其是思想的大门，从中，我们可以聆听到中国社会前进的足音。



另一扇洞开的“历史之门”

一、小引

上一卷书，我们曾以“历史之门”为导论，之所以视十三行为“历史之门”，是因为它的出现，与中国历史上热兵器的出现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也就是说，它洞开了中国走向近代史的大门。

那么，这一卷，当我们从十三行及粤商的习俗与商业禁忌入手，又会洞开怎样一扇“历史之门”呢？

如果我们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理念出发，这扇“历史之门”就不难揭示出来了。因为，即便是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习俗与商业禁忌，也都揭示了思想史的进程。一个时代的思想主流才是那个时代最可信、可靠、可考的历史，是难以颠覆的，也不会是“罗生门”。只有思想史辉映下的历史演进，方可真实、全面或广角地展现出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也就可以确认其演进的动力。历史产生的风俗、信仰、禁忌乃至偏见，是不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一笔抹杀的，尽管后人每每对其轻蔑、讥弹并视为束缚。我们要认识自己，不仅仅是物质的即肉体的，更在于精神的；而精神史所包含的，哪怕是最荒诞的神话、传说，都绝不能忽略。

因此，要进入十三行这一“历史之门”，习俗与商业禁忌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而且是重要的途径。这不仅仅是一种拓展，而且是深化。没有在这上面的拓展，则不可能有对十三行研究之深化。十三行作为南方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环，是体现在市民社会的形成、市场经济的开放乃至城市化进程之

中的。

粤商之所以不同于晋商、徽商，正是因为它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大背景——世界或全球贸易的大规模推进、工商业与农业的分离、国际化都市的出现。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社会的补充成分，而是城市社会的主体——这也是拥有十三行的广州与当时中国其他都市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其让广州成为独一无二的市民城镇。所以，以十三行为代表的粤商，正是这样一个无可替代的、特有的社会组织，从而具有其复杂的制度构成，在习俗信仰、商业禁忌乃至行业语言等方面与内地拉开距离。可以说，由于与当时的世界大帆船时代相衔接，异质文化、启蒙思想也随之进入了市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渗透与排斥、吸纳与淘汰，均极大地丰富、推动了民俗和商业观念的嬗变，这便与内地的民俗、商业禁忌有了很大的不同。与农业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不同，粤商在城市社会中有了很大的话语权，商业也不再是四业中的末业了。而处于这样一个上升阶段中，自有战战兢兢之处，但更多的是豪气与自信，这也对本地的习俗、禁忌产生影响。探讨这一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二、界定

在这里，我们还是先作一个界定。

毫无疑问，十三行行商是粤商中的佼佼者。我曾经把近代粤商的演变，描述为几大阶段：第一阶段，其先行者，自是十三行行商，最早在全球性贸易中大显身手；第二阶段，是洋务运动中出现的诸如唐廷枢、徐润等买办，他们有的本就是十三行的后人，如徐润；而后，则是民族工商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大公司，正是他们，成为辛亥革命的支柱——民商而非官商。经过这一简单的描绘，作为粤商的革命性便逐渐凸显了出来，十三行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作用也就显而易见了，这是从纵向而言的。而从横向来看，粤商当然不仅仅包括十三行行商，也包括当时在进行商业活动的粤籍商人。其实，即便在十三行的地面上，也不仅仅是行商，还有不少行外商人。史载十三行大火，被烧上万家，其中行商也不过十几二十家，其余大都是散商之类，不应把他们排除在外。而且有行商资格者，也在不断变动中，有进有出，有被免职的，有设法退出的，也有新进入的，不可能每一家都由始至终。例如，早中期著名的有黎、谭、陈几家，后期则有潘、卢、伍几家。道光年间，则有“潘卢伍叶，谭左徐杨”，而“一口通商”即1757年间，则是四大家六小家行商，后来自杀的蔡文官，当时还属“小行商”，后来又当上了“行首”。总之，行商不断有变化，处于动态之中。

同时，十三行的粤商，不仅仅是广府商人。过去说十三行含粤、闽、徽三类商人，其中粤商当然是以广府商人为主，而且是以南番顺及四邑的商人为主，但粤人中，还包括客商、潮商，这却每每被人忽略了。其实，如《蜃楼志》这部以十三行为载体的古代长篇小说，其作者便为客家人。在今天深圳龙岗，著名的“坑梓黄”，仍遗留下至少四座巨大的围堡，历史上便属在十三行经营白胡椒的黄姓客家人，而外文资料中，还有骆姓的行商，当为客家人。而潮商很可能就被划入闽商当中了，这是由地缘、语言所造成的。

强调这些，我们是想说明，当我们对十三行及粤商的习俗与禁忌加以研究时，不可以把客商、潮商划出去，更不可以把十三行之外的粤商也划出地界。如果这样画地为牢，我们的研究便有很大的局限，会以偏概全，有失公允了。

在此把这一切说清楚了，有个界定，我们评述起来也就明晰多了，不至于产生混淆。例如，重风水的客家商人，如何把传统带进了整个粤商当中，而这一传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把源头讲明白，后边就不好说了。

三、大海的赋予

泛而言之，整个粤商都是讲“风水”“重意头”的，无论是新铺开张，还是年终“尾牙”；无论是出门办事，还是开洋起航，都得问个吉凶，拜个神灵。直到今天，凡是商铺，都有供神之处，连吃饭喝酒，筷子怎么摆、酒水满几分，都颇有讲究。即便说话，也有不少禁忌……因此，内地人每每认为，粤商是最讲迷信的。有的禁忌，对他们来说几近不可思议。

这是历史形成的，更与地缘不无关系。

粤商习俗，尤其是商业禁忌，其形成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从大的方面看，这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随着经济生活、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就引起了其习俗、禁忌上的改变，这也带来了一切社会关系之间的惯俗的改变。因此，商业习俗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它密切地与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以及交换方式相关联。在农耕社会或自然经济状态下，“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被视为天经地义，于是有了“无商不奸”的偏见。而在市场经济发达之际，平等交易，“不二价”，商业诚信放到了第一位，却又是不易的事实。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中，十三行才在充满毁誉中艰难前行，以至潘家在诗中视西人重承诺为中土的“大古纯纲”。正是在“物畅其流”的状态中，交换有了充分的发展，远远抛离了以物易物的落后方式。而这，势必推动了新的商业民俗的出现。人们不难发现，晋商在商业谈判中，把手伸进套筒中互相凭手指比划达成协议时，十三行的商人已经有了成文的契约，乃至期票了。

在地缘上，粤商的经营之地，均在大海上。十三行位于珠江入海口北部，他们活跃于南洋的巴达维亚等港口，均在航线上。大海历来是古代经商最好的交通载体，所以，地中海才滋育了世界上早期的商业文明。同样，没有大海，更不会有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扩张的到来，而这，使得粤商的商业民俗更与海洋、海洋文明、海上交通息息相关。对于内地习惯山地生活的人而言，大海是世界的尽头，而对于沿海的人们而言，大海方是世界的起点。所以，粤商作为后者，对大海是充满渴望的。当然，大海的变幻莫测、凶险不定，也令他们永远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之中，总在祈求平安、顺畅——顺风顺水，所以，对海神，特别是妈祖的信仰才那么强烈。鲁迅说，粤人“迷信得认真，有魄力”，这正是环境造成的，可以说，是大海赋予的。而在与大海搏斗的壮举中，任何小小的疏漏，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乃至葬身鱼腹。所以，他们的商业禁忌才那么繁杂。只是，细细寻究，都不难找出道理来，以至仪式也变成必不可少的，不仅仅是对于心理而言。

历史与地缘，就这么重塑着粤商“迷信”的形象。

四、“有功则祀”

值得玩味的是，中国独有的妈祖崇拜，发生在宋代。

这时正是中国古代商业社会发展到一个高峰的时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关于“1500年以前的世界”的上卷本中“宋朝的黄金时代”中说：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

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①

其时的南宋临安，据统计，近百万人中，官员占三分之一——因为迁都，官

^①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39页。

员都聚集到此，商贾为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则为市民。可见商业程度有多高。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日趋发达兴旺，中国人意识到了海上的巨大商机，这一条，马可波罗的游记可以证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更可证明。也就是说，海洋成了中国人，尤其成为了东南沿海的中国人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巨大的财富同样伴随着巨大的危机，大海的凶险莫测无疑是走向财富之路的可怕挑战。

而这个时候，妈祖应运而生。

我以为，这与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对忠义之士、名臣名士的敬仰不无关系，不少地方都立祠纪念包括关公、苏轼等历代名贤。这些名贤也都逐步被神化，甚至与神明共同尊奉在一起。罗天尺在其《义仆祠》中更讲了“有功则祀”，即普通义仆出海的过程，颇有意思。

邑人梁廷佐，素尚风义，有担当，数以抗直贾祸，家有仆曾阿喜，百方救免。任定安教官，有士人不胜武弁尊拳者，廷佐率逢掖讼于帅府。帅左袒之，业通祥三院。廷佐曰：“吾有昆仑奴在，无忧也。”遂具详，命仆渡海，夜行七日而达广州，武弁塘递犹未至也，遂得直。而仆于反命日跋涉过瘁，卒于高凉。廷左曰：“是死于吾儒也。”哭而厚殓之，葬于居丁庄右。士人购金就太母食德祠下构祠，貌像俎豆之，后奴屡见灵异。定安水旱灾祲，祈祷如响，春秋赛报，竟成祀典。《礼》曰：“有功则祀。”能死以卫士。士爱而祀之黉宫之旁，宜也。今天子有忠孝祠，义，亦忠类也。士而畏死偷生，不忠所事，士也而奴之，摈之宫墙外。奴而尽瘁，忠于所事，奴也而士之，进之宫墙内。况泽及民生，又在死后耶！^①

而林默娘正是为救溺水者而亡的，她的人道精神与舍己行为广泛流播，最后被立祠以纪念，并且一步步被神化。

司徒尚纪在《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阐述了这一过程：

最具深刻影响力和最有群众基础的首推妈祖崇拜，至今已演变为岭南海洋文化的一个最重要元素。按：妈祖，姓林氏，福建莆田湄洲岛人，叫林默娘，少有异术，30岁而亡，当地人尊为神，为其建庙。北宋宣和年间，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在途中遇到风暴，传得到妈祖保佑，顺利抵达目的地。回来后，他向朝廷为妈祖请封，获得宋徽宗允准，基庙被命名为“顺济庙”，此后妈祖多次显灵，也多次受封。到宋末，妈祖得到封号已有14次之多，在宋代亦不多见。元代，海运非常发达，泉州升为全国第一港，海

^① 吴绮，等：《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